

代云红 著

中国文学人类学 基本问题研究

*Zhongguo Wenxue Renleixue
Jiben Wenti Yanjiu*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代云红 ◎ 著

中国文学人类学 基本问题研究

Zhongguo Wenxue Renleixue
Jiben Wenti Yanjiu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 / 代云红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5482 - 1029 - 0

I. ①中… II. ①代…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464 号

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

代云红 著

策划编辑: 徐 曼

责任编辑: 刘 焰

封面设计: 周 旸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029 - 0

定 价: 46.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序

不知怎地，读完本书稿，我心头冒出的第一个字眼是“厚重”。仔细想来，不仅仅是代云红的长相面容和为人处世给我这种厚重感，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之道与研究成果确实确实体现出一种平实、厚重的品格。鲁迅在《北人与南人》的杂文中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鲁迅这一观点的相关背景有两点值得指出：其一，鲁迅的杂文《“京派”与“海派”》与《北人与南人》写于同一天，是相关性或延伸性思考的结果；其二，两文都提到学界、学术、学者，因此他的观点至少包括学术风格的差异问题。我不知道作为云南人的代云红究竟应该归属于南人还是北人；我也理解按照萨义德“某某不是铁板一块”的后现代解构策略，可以顷刻消解鲁迅的经验性结论。但我觉得，悬置地域性话题，厚重作为一种学术品质或是用厚重来描述、评价个人性的学术行为，还是可行的。尽管代云红的这部著作厚重中也不乏机灵，但用厚重来概括本书特色，应该是成立的。

首先是论题的厚重。“文学人类学”作为专用术语出现在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但通常的做法是将其历史追溯到20世纪初广义、杂义或相关义的前史阶段。可以说，文学人类学已经“历史化”了，它具备了自己的历史和历史叙述的可能。但一旦进入“历史”，同时也意味着问题的历久层累与疑虑丛生、众说纷纭。因此，与其叙史，不如在历史中发现问题、梳理分歧、探寻答案。这就是代云红切入文学人类学研究所选择的独特路径。“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与通往创新的坦途。正是强烈而自觉的问题意识，使代云红在文学人类学的诸多具体问题中选择性、针对性地构筑他的问题群、

问题域。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这五个基本问题形成了本书的研究与论述框架，每个问题都因其基础性与根本性而产生学术论题的厚重感。

其次是材料与方法的厚重。用厚重来形容研究方法 with 思考路径似乎有些不太妥当。这里指的是老实人做学问的方法，即扎实与深入。代云红曾直言自己的思考方法与论述步骤：“本书在探讨文学人类学五个基本问题方面遵循如下的思考路向：①归纳和概括同类问题中的认识分歧；②通过辨析各种认识分歧，揭示产生分歧的原因；③对分歧现象进行理论辨析及阐释，发现分歧中的‘同一性’问题；④从文学人类学的整合性意义上提出文学人类学的整合及建构的思考性意见。”这样的步骤似乎把自己限定得死死的，甚或有点繁复之意，无灵巧飘洒之感，但它具有逻辑的合理性，论证的可靠性。在材料的搜集、阅读、梳理与概括上，得下死工夫，增加工作量。好在代云红历来是“讷于言，敏于行”的，坚信勤奋是自己学术进步的台阶，因此材料的尽可能详尽齐全、材料工夫上的深厚持重可谓本书一大特色。

再次是结论与观点的厚重。从逻辑上说，论题的厚重、材料与方法的厚重往往导致结论和研究成果的厚重。但一般人们评价结论或成果的更通常标准是创新，即创新性是学术研究唯一的动力与归宿。其实，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所以是优点，就在于厚重、机灵都是通往学术创新的常规路径。就代云红而言，他的厚重治学之道必有观点创新之获。本书第一章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内涵与边界”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有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反思，都将其与当时的“方法论热”、“寻根文学热”、“文化热”展开关联性考察与思考，都没有提到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与 20 世纪 80 年代语境中文艺本体论讨论的联结。代云红发现了这一重要的被理论视野所遮蔽或疏漏的问题。这一发现，来源于代云红文艺学专业的训练及相应学术视野的开阔；来源于他对文学人类学与文艺学双重学术史资料的厚重把握；来源于他自觉的问题意识与对问题穷根究底的求真精神。他的发现与结论是富于创新的，也因学风的扎实厚重而拥有更强的说服力。

正如鲁迅在论述北人与南人的学术风范中也提到北人南相与南人北相的问题，我也同样在本书的厚重风格中见出了机灵的一面。代云红的机灵，来自他对弗莱著作的深入研读与透彻理解，体现在他的学术立场与基本思想对弗莱的吸纳、借鉴与修正。代云红在本书前言中说：“在辨析各种分歧时，

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对批评困境的认识就可为我们探究分歧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意义。事实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吸收了经过修正后的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从本书的整体思考来看，本书吸收了弗莱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不同观点之间的逻辑论证的分歧可能掩盖了一致性，但一致性确是存在的。二是既注意在多样性和新颖性中发现‘同一性’，也注意在‘同一性’中发现多样性和新颖性。”如果说厚重是本书的骨肉，那么机灵就是本书的魂魄。

我与代云红相识、交往二十余年。最初，他上本科时我开过“文学概论”课，做过关于文学人类学的讲座；以后他在大学任教，作为访问学者曾由我指导；数年后他成了我的硕士生、博士生。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代云红的某些学术趣向和观点与我不尽相同，如他在本书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层级性系统中，将哲学层视为最高，表现出对哲学人类学的向往。而我受过“哲学崇拜热”的洗礼，对此有着绝望与免疫。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借用文化人类学，就是为了躲避形而上的哲学。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在立场和观点上与导师一致，不利于创新，也是出息不大的表征。我倒是衷心希望在代云红今后的研究与著作中，看到更多的与我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创新性观点，这意味着他学术上的成熟、独立与自成一家。

方克强

2012年2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前言

“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及个人现象。我们在看待“文学人类学”概念、历史、理论、方法及价值观方面的认识分歧时，应首先考虑上述几方面的原因。

分歧与共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构成了对同一个问题的完整性呈现。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学人类学”的认识分歧既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同时也暴露出文学人类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因而，在辨析各种认识分歧时，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对文学批评困境的认识就可为我们探究分歧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意义。事实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吸收了经过重释及修正后的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在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出现在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中，这不是我们刻意而为之的，而是因为：一是弗莱的文学人类学理论一直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之一；二是弗莱的文学人类学理论具有多重面向，它与我们所探讨的某些问题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从本书的整体思考来看，本书主要吸收了弗莱的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不同观点之间的逻辑论证的分歧可能掩盖了一致性，但一致性确实存在；^①二是既注意在多样性和新颖性中发现“同一性”，也注意在“同一性”中发现多样性和新颖性。简言之，本书主张“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本书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

^① [加] 诺斯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一、本书的研究原则及思路

在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中,针对文学人类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这些研究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也是本书研究的资料来源。但针对问题群或问题域的研究却是相当薄弱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把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分歧作为一个对象域来进行理论探讨的研究是少之又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书的特殊视角及研究价值和意义。由于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的研究,因而本书在事实上不可能把所有文学人类学的问题都尽收入本书之中加以辨析及思考,因此本书选择了“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域,按照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的认知框架来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五个基本问题中的认识分歧,在复杂性及多样性中发现“同一性”,然后又在“同一性”中审度多样性与新颖性。总之,从文学人类学的整合性视野出发,探讨分歧,阐释被各种分歧所遮盖的一致性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本书对问题群或问题域的探讨带有“反思”(reflexion)的含义,因为对各种认识分歧的辨析需要揭示产生分歧的根源。“反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按照“反思”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反思”就是“返回”到问题“原来的出发点”,把“原来的出发点”变成研究问题的目的地。^①由此来讲,“反思”首先是一种由果及因的溯源性探究——即探究原因的研究,“反思”的目的就是分析产生分歧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的原因。二是“反思”是针对特定区域内的具体现象或具体问题的反思。正如王铭铭在论及人类学反思时指出的:“你原来是研究非洲的,那么你在本地区内去梳理你的理论脉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反思才是扎实的。你不能随便提出一个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反思就能代表一切。不是这样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太平洋模式的,那么对他的反思可能在那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是你拿到印度,印度的人类学是另外一个话题。”^②王铭铭认为,对中国人类学的反思,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展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活动中,我们出现

^① [美]曼·弗兰克:《正在到来的上帝》,让-弗·利奥塔等著:《后现代主义》,赵一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② 徐新建、王铭铭、周大鸣等:《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会议纪实》,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过什么样的关键概念和关键研究。这些关键概念和关键研究构成了一个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不单是由中国人自己独自拥有，而且还包括了大批在中国展开了人类学研究的外国学者。^①王铭铭对“反思”的阐释，一方面道出了“反思”是一种语境化研究，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反思”的区域性内涵。本书赞同王铭铭对“反思”的这种理解，这也是本书以“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缘故。总之，本书所蕴涵的“反思”内涵，表明本书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既是原因式的溯源研究，也是语境化的比较研究。也就是说，对中国文学人类学五个基本问题中的认识分歧的辨析及理论阐释需要“还原”到产生分歧的最初内外语境中加以审度。

本书采用问题群或问题域的分类方式，把文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认识分歧归纳为五个基本问题。从总体上讲，本书遵循的思考路向是从现象梳理入手，探讨其学术脉络，辨析分歧，探寻原因，发现“同一性”，然后在理论阐释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及建构的问题。具体来看，本书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五个基本问题方面遵循如下的思考路向：①归纳和概括同类问题中的认识分歧；②通过辨析各种认识分歧，揭示产生分歧的原因；③对分歧现象进行理论辨析及阐释，发现分歧中的“同一性”问题；④从文学人类学的整合性意义上提出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及建构的思考性意见。从总体上讲，本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目的在于通过对分歧的辨析来思考及发展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及理论探索的一种初步的思考。从每章对问题的展开方式来讲，本书采取的是由表及里、逐步推进、逐层深入的思考路向，这也构成了每章内的节与节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总之，本书在总体和局部的思考路向上是统一的。

二、本书的结构安排及分析要点

本书的整体架构包括前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正文按照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的认知框架来安排研究内容。

^① 徐新建、王铭铭、周大鸣等：《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会议纪要》，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章是文学人类学的内涵与边界。本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学人类学”的认识分歧：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和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从各类评述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论著来看，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语境中出现的对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分歧影响了对“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学科归属的“定位”问题，同时也影响了“文学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路向。由于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语境中出现的认识分歧，哲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基本上是分道而行的。另外，从三个方面的“文学人类学”的认识分歧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语境中的认识分歧是影响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和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认识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的问题，是这些分歧的焦点。无论是本体论语境中的分歧，还是学科交叉中的分歧或是把“文学人类学”依附于文艺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分歧，都缺乏对“人类学”和“文学”两个熟知性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第二章是文学人类学历史的分与合。本章主要分析文学人类学历史中的四个关键性问题：历史起点、历史分期、对20世纪50~70年代学术的评价、海峡两岸的“文学人类学”。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重构包括如何理解“文学人类学”的问题，它包括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疆界、理论及方法论范式等的认识。从总体来看，研究者大多缺乏对自身理论前提的自觉反省意识。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探讨主要限于文学性神话的维度及视角以及神话仪式学派理论和原型批评理论，这造成了一定的褊狭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大陆20世纪50~70年代学术研究的评价以及对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介绍。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对自身历史和现代学术传统的爬梳及研究还不是很充分。相比较而言，除了叶舒宪、王大桥等少数学者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评述外，绝大多数论者更加关注当代文学人类学历史的研究，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及研究。另外，在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进行整体评述方面，除了叶舒宪在20世纪90年代介绍原型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时，简略提到台湾70~80年代神话原型批评研究的情况

外，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探讨很少考虑到海峡两岸研究的共性与异相问题。总之，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或学术史）的研究是文学人类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的一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当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

第三章是文学人类学的写作与理论。本章以辨析中西方“人类学写作”的认识分歧为前提，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与建构问题。从中外学者的探讨来看，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两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存在着学科原则上的分歧：一是对“真实”及“虚构”的不同理解；二是对“跨文体”写作的不同理解。“人类学写作”模糊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反映了对宏大叙事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由此对文化差异性、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及研究。从深层次原因来看，“人类学写作”产生的动因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认知观念的变化。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人类学写作”凸显了人类“表述”问题，从中我们注意到，不仅在人类学领域，而且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对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都是探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在对“人类学写作”和“写文化”的讨论中，人类学与文学在人类“表述”问题上具有科际整合的基础，这就为我们探讨“人类学”与“文学”结合部的问题，以及“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整合及建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或切入点。

第四章是文学人类学的证据与方法。本章主要分析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内涵、历史渊源、现代变革意义以及不足。多重证据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学术界众所周知与叶舒宪和萧兵的极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们提出的三重或四重证据法不仅续接了王国维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而且还使（主要限于史学领域的）多重证据法获得了文学人类学的内涵，成为文学人类学的主要方法论。从二重到（目前的）四重证据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多重证据法的分水岭是四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与二重、三重证据法最大的不同是：四重证据法是以口头文化为基本价值立场的，它虽然仍保持着二重、三重证据法的“场域”结构形态，但它的场域中心已由文字中心转向非文字中心。在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里蕴涵着“文化寻根”与“文明反思”的批判性内涵，大多数评述者因忽视了四重证据法与二重、三重证据法中的视点转移、研究中心转移及价值观念差异而低估了

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的价值及意义。从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多重证据法历史的研究来看,大多忽略了二重到三重证据法转变过程中复杂的历史问题,因而也影响了对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的正确认识。不过,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也存在夸大某一媒介证据作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媒介霸权和符号暴力的问题。

第五章是文学人类学的功能与价值观。本章主要分析当代“文学治疗”研究,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之争,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和由此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等问题。从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人类学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性和建设性的思考,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虽然注意到了口头文化(文学)与书写文化(文学)的反差性及思想的和心理的表现特征,但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最主要的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缺乏媒介环境学和环境文学批评的关注,在文学人类学价值取向上缺乏“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或“环境不公正”(environmental injustice)的环境伦理批评的价值理念,^①这反映出文学人类学理论探索和整合的力度仍有待加强和深入。

总的来看,本书所概括及分析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五个基本问题是当前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中还比较薄弱的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的初步研究,将会为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知识体系提供一条可能的或可参考的研究路径。

^① “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或“环境不公正”(environmental injustice)是美国新生态批评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提出的一正一反两个核心概念。详情参阅生安锋《人文关切与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劳伦斯·布依尔访谈录》,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另见方红对劳伦斯·布依尔思想的评述,方红《论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文学批评理论》,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人类学的内涵与边界·····	(1)
第一节 “文学人类学”的歧义·····	(5)
一、文艺本体论讨论中的“人类学转向”·····	(7)
二、文艺本体论讨论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	(11)
三、文艺本体论讨论中的神话—原型批评·····	(15)
第二节 “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21)
一、本体论中的“文学”与“人类学”结合·····	(21)
二、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与“人类学”结合·····	(27)
三、跨学科多元互动中的“文学人类学”·····	(32)
第三节 现代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	(34)
一、“文学人类学”与“文艺学”·····	(35)
二、“文学人类学”与“人类学”·····	(38)
三、“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	(41)
四、小结：还没有结尾的结尾·····	(46)

第二章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分与合	(52)
第一节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	(54)
一、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认识分歧	(54)
二、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	(59)
第二节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分期	(70)
一、百年文学人类学历史分期的论述	(70)
二、新时期文学人类学历史分期的论述	(73)
三、文学人类学历史中的认识问题	(77)
第三节 海峡两岸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共性与异相	(87)
一、大陆与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共性	(89)
二、大陆与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异相	(94)
 第三章 文学人类学的写作与理论	(106)
第一节 中国语境中的“人类学写作”	(106)
一、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	(106)
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	(112)
三、“人类学写作”的理论探讨	(118)
第二节 西方语境中的“人类学写作”概述	(125)
一、西方语境中的“人类学写作”	(125)
二、人类“表述”问题与“人类学写作”	(130)
三、“语言学转向”与“人类学写作”	(136)

第三节 人类“表述”问题与文学人类学理论	(138)
一、文艺学视野中的文学人类学理论	(140)
二、弗莱理论与口头诗学理论的关联性	(153)
三、民族志批评与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互补性	(162)
 第四章 文学人类学的证据与方法	(168)
第一节 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内涵	(169)
一、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提出	(169)
二、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内涵	(173)
第二节 “多重证据法”的历史渊源与现代变革	(176)
一、“多重证据法”的历史渊源	(176)
二、“多重证据法”的现代变革	(187)
第三节 “多重证据法”的意义与不足	(191)
一、符号学、证据法学视阈中的多重证据法	(192)
二、媒介学视阈中的多重证据法	(209)
 第五章 文学人类学的功能与价值观	(220)
第一节 文学的心理治疗与生态伦理功能研究	(220)
一、当代中国“文学治疗”研究的基本状况及 价值指向	(221)
二、文学治疗原理的阐释	(227)

三、文学治疗的生态伦理及文学人类学意义	(233)
第二节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之争	(237)
一、田野与文本之争	(238)
二、口语文化与书写文化之争	(244)
三、文学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文学史观”	(252)
第三节 重建文学人类学的价值观	(263)
一、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	(263)
二、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价值观	(264)
三、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环境伦理批评观	(281)
 第六章 结 语	 (288)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304)

第一章 文学人类学的内涵与边界

“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产生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及个人现象。因此，我们在看待“文学人类学”在概念、内涵及方法等方面的认识分歧时，应首先从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的角度来揭示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产生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及方法等的认识分歧就已经出现了。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从两篇总结性评述文章说起。

较早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人类学”产生原因进行总结性评述的是方克强。他首先在《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兴起及原则》^①一文里指出，文学人类学批评是“方法论热”中悄然兴起的一种新批评方法，其批评内涵及价值趋向是站在人类本位立场上对文学现象作跨文化的探究，在常识确认的差异性中揭示其中的同一性与连续性。方克强认为，这种新批评方法兴起的背景及原因有三：第一，现代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为文学人类学提供了现实课题；第二，最直接的原因是新时期文学本身的发展；第三，受西方神话原型批评方法的影响和启发。另外，他认为，把文学人类学批评等同于神话原型批评是一种误解。他说，文学人类学批评在内容上应由原始主义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组成，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原始主义批评侧重对原始与现代的现实张力关系的评析，神话原型批评侧重对原始与现代的超现实的心理想象的持续性及永恒性价值的解析。^②随后，他在《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中又作了更加系统的总结性评述。他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人类学”的发生有“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远因”是茅盾、闻一多等人在20

①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兴起及原则》，载《文艺报》1988年7月2日。

②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内容与前景》，载《上海文学》1992年第1期。